

出版情物 · 研究

出版文化的新世界

香港与上海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出版博物馆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博物馆·研究

出版文化的新世界

香港与上海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编
出版博物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博物馆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出版博物馆·研究)

ISBN 978-7-208-09725-4

I. ①出… II. ①香…②出… III. ①出版工作—文集 IV. ①G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9486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王京芳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伍贻晴

· 出版博物馆·研究 ·

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出版博物馆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2 插页 4 字数 340,000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725-4/G·1401

定价 45.00元

出版物作文库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顾问: 丁景唐 吴道弘 周振鹤 郑培凯

委员: 马西尼(Federico Masini)

内田庆市(Uchida Keiichi) 王宏志 冯锦荣

杨 扬 陈子善 陈正宏 张西平 沈国威

邹振环 阿梅龙(Iwo Amelung)

顾有信(Joachim Kurtz) 陶德民 韩 琦

鲁 纳(Rune Svarverud)

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李新立

副主任: 王为松 林丽成

委 员: 张 霞 孙 瑜 王京芳 王草倩

高 明 毛志辉

序 言

郑培凯

(香港城市大学)

过去人们讲起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总是说“四大发明”:火药、罗盘、纸、印刷术。这是我们民族智慧的骄傲。然而,老师在课堂上讲述,小学生在课后背诵,依样葫芦,并没有想过这四大发明,尤其是纸与印刷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都扮演了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互动的角色。人类知识得以传递,文化得以累积并且普及,文字载体通过纸张的印刷发行,使新知广为流传,化一为百为千为万,在短时间内产生连锁影响,使人类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变动,其功厥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文化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变化,可以从书刊出版得知情况,并且由此推知其发展脉络。因此,出版史的研究,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不能仅仅研究图书本身,像古人那样只偏重版本与藏书研究。更重要的是,要从图书目录学、版本校勘学的园囿走出来,研究图书出版的內因与外缘,探索涉及文化传播的相关课题,以期理解知识体系的形成、知识结构的变化、新知传播的脉络等等。

在2008年出版博物馆(筹)与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版史会议上,我作过主题发言,呼吁出版史研究的方向,应该“以书刊出版为核心,以书刊传播为关键,受文化影响是重点,以文化交流为流韵”。因此,我在组织2009年第二届中国出版史会议的时候,就想集中探讨出版史涉及的文化交流议题,阐明文化交流的“流韵”究竟是什么,在文化变迁的脉络中,

是如何渗入原有的知识肌理,如何刺激及调整知识体系,如何改变知识结构,展现其影响的流风余韵。恰好出版博物馆(筹)的林丽成女士建议,以上海与香港两地的出版及其交流互动,作为第二届会议的主题,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我就把会议的议题定作“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内容集中在上海与香港的近代出版事业,以具体的出版实例,展示东西文化在近代接触碰撞之时,传播新知的物质基础如何发生变化,出版印刷的运作结构与模式如何发展,新式报刊如何改变人们的认识与知识结构,新知的传播如何影响了社会阶层的变动,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视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方方面面。

会议如期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召开,内地、香港、台湾,以及来自欧美日本的学者齐聚一堂,热烈研讨,交换学术心得。会后决定出版一本论文集,以示出版史的学术研讨成果,也要通过出版这个手段,传布影响,把我们规划与探索的心得公诸于世,推动知识结构的调适,促进文化与学术的发展。会议原本以中英两种语言场次进行,有些论文以英文写成,在编辑本书时,英文论文的作者希望另行刊出,所以就没有纳入本书。也有个别论文作者因为无暇修改论文,赶不上出版的时限,也就无法在书中呈现。不过,我们要感谢所有参与研讨会的学者,他们的参与及所提的宝贵意见,促成了学术交流,造就了本书的结集与出版。

我们按照会议原本的构思及论文性质,把论文分成四大类,显示近代中国“出版文化的新世界”是如何形成的。第一类是“西学东渐与中国出版”,第二类是“沪港出版交流”,第三类是“图书出版与文化互动”,第四类是“出版与语言接触”,从不同侧面观察及思考近代出版业的变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总结这两届中国出版史会议的成果,我感觉还有许多议题值得学者多作探索,如“出版文化的旧世界”,也应该采用出版史的新方法来探索。对中国历朝历代出版,特别是宋代以后,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影响,不论是出版业及其市场的结构变化,不同类别书刊出版的阶级划分及融通,还是阅读延伸的知识渗透,上层与下层文化意识的交错互动,都需要重新审视。明代

后期出版业大盛,恰好也是早期耶稣会传播西学的时代,放在中西两种不同的出版传统与环境脉络中,对于当时中西出版传播知识的比较研究,也是以后可以多作探索的方向。此外,对于图像出版的研究,也应该扩大思考的范围,不只是作为文字的附属插图来对比研究,还要探索图像的视觉影响,以及图像载体所传递的文化讯息。由此看来,出版史研究还有极为广阔的天地,有待我们去开发探究。

我要藉本书出版的机会,感谢和我一同规划会议及编辑本书的同事林学忠博士与黄海涛先生,并对出版博物馆(筹)的林丽成女士及王京芳博士,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邹振环教授,上海人民出版社毛志辉编辑的鼎力支持,以及编印本书的其他工作人员,表示特殊敬意。他们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不但反映了工作态度的严谨,也显示令人钦佩的效率,使得本书在很短的期限之内,得以顺利完成。假如本书还有一些瑕疵,恐怕也在所难免,还请恕宥。

目 录

序言	郑培凯 (1)
西学东渐与中国出版	
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	邹振环 (3)
菲律宾早期的中文刻本再研究	
——以《新刊格物穷理便览》为中心	张西平 (27)
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字编排方式的变迁	张志强 (51)
海关造册处与中国近代出版	章宏伟 (62)
邵洵美、项美丽与《天下》	王京芳 (98)
沪港出版交流	
从澳门、香港到上海	
——19 世纪中叶西方活字印刷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韩 琦 (141)
松本白华在香港和上海的经历	川边雄大 (152)
郑振铎与香港出版文化	陈福康 (165)
25 年前在香港举办的上海书展	林丽成 (179)

图书出版与文化互动

香港英华书院的出版物在上海和日本

——以《遐迩贯珍》、《智环启蒙》为中心 沈国威 (201)

书籍之路回流：近代中国刊刻的日本汉籍 王 勇 (220)

雕镂天花乱坠的世界

——由一本貌似无聊的小书来看清末旧式雕版印刷 辛德勇 (239)

出版与语言接触

见闻、谈资与讽刺诗

——中国洋泾浜英语在 18 至 20 世纪初西方出版物中的
流传 司 佳 (253)

粤词官音

——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的过渡性质 程美宝 (269)

新词新概念的吸收和对应

——日本对自然科学词汇的吸收 陈力卫 (285)

跋：我所认知的出版史研究(发言提纲) 周振鹤 (305)

圆桌会议纪要 王京芳 (313)

会议综述 王京芳 (334)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Pei-kai Cheng (1)
----------------	---------------------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Publication of China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Shanghai	Zhenhuan Zou (3)
A Second Study of Early Block-Printed Chinese Books in the Philippines: On <i>símbolo de la Fe, en lengua y letra China</i>	Xiping Zhang (27)
Sino-Western Cultural Contact and Chan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rangement	Zhiqiang Zhang (51)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Customhouse and the Publishing of Modern China	Hongwei Zhang (62)
Sinmay Zau, Emily Hahn, and <i>T'ien Hsia</i>	Jingfang Wang (98)

Communication in Publishing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to Shanghai: The Promotion of Western Movable Type Printing in Mid-19 th -Century China	Qi Han (141)
Hakka Matsumoto's Day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Study Notes	Yutai Kawabe (152)
Cheng Chen-to and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Hong Kong	Fukang Chen (165)

Shanghai Book Fair in Hong Kong 25 Years Ago Licheng Lin (179)

Book Publishing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Publications of Ying Wa College (Hong Kong) in Shanghai and Japan:

*On Chinese Serials and 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 Gradation I* Guowei Shen (201)

The Backflow of Bibliographic Currents: *Kanseki* Printed in Modern
China Yong Wang (220)

Carving a Grandiose World: Thoughts on Late-Qing Block Printing
after Reading a Seemingly Banal Booklet Deyong Xin (239)

Publishing and Philological Contact

Sight-Sound, Chit-Chat, and Satire: Chinese Pidgin English in Western

Publications from the 18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Jia Si (253)

Teaching Mandarin with Cantonese Vocabulary: the transitivenes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Ying Hwa Yun-fu Lih-kai*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Meibao Chen (269)

Ingestion and Digestion of New Words and New Concepts: Terms of

Natural Sciences Adopted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Liwei Chen (285)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in My Eyes (Speech Outline)

Zhenhe Zhou (305)

Roundtable Conference Compendium

Jingfang Wang (313)

Summary of the Conference

Jingfang Wang (334)

西学东渐与中国出版

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 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

邹振环

(复旦大学历史系)

在中国近代新式印刷出版业兴起的过程中,土山湾印书馆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地位。该馆从 1867 年设立印刷所起,至 1958 年公私合营,前后持续了 90 余年。后属徐汇区大华中心厂领导,并随中心厂并入上海中华印刷厂。该馆偏重西文印刷,但中文出版物也曾在全国教会出版系统中独占鳌头,20 世纪 30 年代,创下了印刷品总数达 53 万种的纪录。^① 在全国 29 家天主教出版机构中,曾占天主教出版物总数达 32.3% 的份额。^② 然而,由于中文资料的相对稀少和西文资料开发的有限,关于土山湾印书馆至今仍存在有许多盲点,该馆究竟何时创设? 该馆的名称及其与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工场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土山湾印书馆引进了哪些新式印刷技术? 该馆有哪些主要的出版物,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澄清。本文利用目前所见的有限资料,在尝试解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着重讨论该馆所从事的印刷出版活动对于近代上海印刷出版文化发展的影响与意义。

一、土山湾印书馆的创办与传统雕版印刷技术的运用

1849 年天主教巴黎耶稣会士在青浦县横塘(现松江县息安骨灰堂)的天主

①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03 页。

② 据 1946 年《上智编译馆馆刊》所载《近十年来我国天主教出版书籍总目》的统计,1937 年共出书 57 种,土山湾占 15 种;1938 年 42 种,土山湾 14 种;1939 年 66 种,土山湾 15 种。转引自李天纲:《新耶稣会与徐家汇文化事业》,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5 页。

堂创建了一所孤儿院。咸丰五年(1855)迁至蔡家湾,孤儿院让孤儿学习包括雕版印刷在内的各种手艺,为孤儿院有印刷活动之始。此一时期“印刷工场”的负责人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夏显德神父^①兼任。太平天国战事期间蔡家湾孤儿院一度迁至董家渡。同治三年(1864),位于徐家汇肇嘉浜中段一转弯角的土山墩被“削为平地”,同年冬天建造了第一排房屋,蔡家湾孤儿院正式迁至徐家汇土山湾,定名为土山湾孤儿院。^②一些绘画史论著似乎都认为早期土山湾并不存在印书馆,印刷活动只是作为土山湾美术工场或土山湾画馆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的。如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一书称:“育婴堂实即一美术之工场也。……堂中工场有印刷、装订、绘画、照相、冶金、细金、木工、木雕、泥塑、玻璃制作等。”^③其实印书工场已经萌芽,但其时规模很小,印刷品单一(大多为明末清初汉文西书的重印),且发行范围有限,因此,确实尚算不上是独立的出版机构。

根据法国史式微《江南传教史》记载:1867年已有孤儿342人,土山湾孤儿院在原来蔡家湾孤儿学习手艺的基础上,设立了制作宗教用品和印刷宗教经书的工场和印刷所,让12岁的儿童学习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油漆、绘画,以及“刻写印刷用的汉字、木版”等手艺。从那时起,“土山湾孤儿院为教区做着一件杰出的工作,那就是它的印书馆。这所孤儿院印书馆成了传教区最活跃、最得力的传教工具。在1869年,它至少已拥有‘七十种作品的木版,都是有关宗教和引人热心的圣书,或为教外归化,或为圣教辩护,或为训导培养教友虔诚精修’。其中大部分是十七、十八世纪由利玛窦、柏应理、李玛诺、南怀仁、艾儒略、潘国光、庞迪我等旧耶稣会神父的优秀作品的再版;后又增加了李秀芳与晁德莅两位合著的《圣母月》和李秀芳著的《若瑟月》”^④。根据这一段材料,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两年内已经能够印制出70种关于天主教教义和圣教辩护的木版书,没有一个专门运营系统的印书机构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土山湾印书馆在1867年应该在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工场中,

① 夏显德(Francisco Giaquinto, 1818—1864),字懋修,意大利籍耶稣会士,1849年来华。

② 参见古闽林骆署签:《徐汇纪略》(十三·土山湾),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版。该书无页码。

③ 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163页;或称1867年土山湾孤儿院建成第二排房屋,其工艺工场(又称土山湾孤儿院美术工场)包括缝纫、制鞋、木工、金属制品、绘画、雕塑、印刷等工场,才开始全面授徒。参见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

④ [法]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转引自[法]史式微著,天主教上海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294、296页。

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由“印刷部”、“发行部”组成,但早期印书馆在对外使用的名称上尚不稳定,由于孤儿院内有慈母堂,因此早期出版物多称“土山湾慈母堂藏板”,所出版的书目也以“慈母堂”为名^①,之后或称“徐汇书坊”、“土山湾天主教孤儿院印刷所”、“土山湾育婴堂印书馆”、“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土山湾印书房”等等;至20世纪初,大多在出版物的版权页上标注“土山湾印书馆”。二是与墨海书馆类似,尽管土山湾后来一直被视为西方近代印刷术东传中国的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但早期该馆缘于客观条件,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因此,土山湾印书馆事实上是在印刷术领域实施中西印刷技术对话与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土山湾印书馆不久后成为上海印刷出版业采用西方新式印刷术的引路人,是与该馆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该馆初创时期就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木版印刷术翻印了大量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汉文西书,在装订技术上也利用了传统古籍的装订样式。

为早期土山湾印书馆培养印刷技术人员作出过重大贡献者,是法国耶稣会士苏念证神父(Hippolytus Bosuiou, 1824—1886,又作苏念澄,字清渠)。他1865年来华,1866—1879年间主要担任上海洋泾浜若瑟堂院长。1870年前后他买下了一套铅铸中国字,一向置于洋泾浜大堂东之洋楼内,于1873年夏秋之间搬至土山湾。在法国耶稣会士严思愠(Stanislas Bernier, 1839—1903,字慎斋)尚未接手印书馆前一两年,他就“已安排一土山湾孩、蔡家湾出身名陈阿弟(克昌)与钱斐理(江湾大场人,系汇学生,进小修院而未成者)。遣此二人往上海虹口望益纸馆印书房去学习排铅字,为预备江南省设印书处,为传教之用”。同时在该馆印书房学习排字的还有后来回到土山湾的顾朗如和陈鹿门。虹口望益纸馆印书房系葡萄牙富商、后来出任过上海葡国总领事的Carnai所开设。^②

1870年土山湾印书馆成立不久,即盘入上海一家外国印刷所,买进一些印刷机和外文铅字模,又添置了一些中文铅字模,成立了铅字部。^③ 据《江南育婴堂记》稿本,同治十三年(1874)出任土山湾首任“管账”先生的是严思愠,1866年

① 1898年该馆发行有《慈母堂经书价目》,收录各类中文书籍259种。参见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554页。

② 《江南育婴堂记》稿本,作者不详,载[比利时]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五),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版(下简注《江南育婴堂记》),第2505—2507页。

③ 该外国印刷所究竟是哪一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墨海书馆结束在19世纪60年代,该馆是否有可能将不再使用的印刷机械转让给土山湾印书馆,此推测录存备考。

来华,后兼管铅版和印书事务。严思愠负责印书馆期间正式以活字印刷出版的第一本西文书,可能是1873年出版的天文台推算的附有日出日没时刻表的《徐家汇天文台观测公报》(*Bulletins des Observations de Zi-Ka-Wei*);用活版排印的第一本中文书籍是教徒们望弥撒用的《弥撒规程》^①,为土山湾印书馆从印刷工场向出版机构过渡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当时土山湾仍然使用蔡家湾时期的雕版印刷术,并逐步用新的木版来代替正在使用的旧雕版。他“兼管铅板印书事务。铅字印书架子装在堂前西夹壁两间”,并起用曾在美华书馆工作过的宁波人徐某“帮助布置铅字架子等”,“印手”有南京人钱某、陆关荣等三人,他们属于“土山湾印书房之开手人也”^②。可见1874年已开始有了活字铅版印刷。

1874年之后实际主持印书馆的是法国耶稣会修士翁寿祺(Casinirus



图1 土山湾印书馆早期负责人翁寿祺

Hersant, 1830—1895, 字锡眉)。他1859年来华,堪称是一个技术天才,“精于修理钟表,兼晓医理,善待病人,常在汇院任司病职,兼修理钟表,亦善拍照。当时之拍日照。其法尚未成全,盖照片药水件件必须自行配合,拍一小照,又须历时颇久,翁相公行之,颇得其法,当时知拍照者甚稀,所拍之照,作为珍奇,而徐家汇院房并诸位老神父遗像,及江南初起遗迹,至今存留不少者,是皆翁相公之劳绩也”^③。初起他“自己学习排字,兼管石印”。1876年严思愠调任张泾本堂,印书馆由翁相公接手,他嘱咐陈阿弟(克昌)查核印书馆所缺少却又为印书馆所不可或缺的“应用之件,一一开账,至法国添办,渐臻完美”^④。翁寿

① 《徐家汇天文台观测公报》可能曾译作《周年占礼经》或《周年瞻礼经》,参见庄素原:《土山湾印书馆琐记》,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② 《江南育婴堂记》,第2504—2505、2507—2508页。

③ 《江南育婴堂记》,第2508—2509页。“相公”为旧时对上层社会年轻人的敬称,天主教徒多习惯将“修士”称为“相公”。后来土山湾印书馆成为近代引进西方照相印刷制版的先驱,是否与翁寿祺长期致力于照相技术的探索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土山湾印书馆1900年开始试验照相制版,到1901年获得成功,1902年始设照相制版部。1910年左右商务印书馆在土山湾照相铜锌版基础上进行改良,试制出三色版,将彩色铜版印刷技术引入中国。

④ 《江南育婴堂记》,第2510页。